

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山西篇）

我们曾经年轻（1）

本报特约撰稿人：董丰

导读：为纪念中国知青运动五十周年，由《中国知青文库》编委会（以武汉大学出版社为主）、文化部《文化大视野》编委会、香港中华知青作家学会、中国青年作家学会、北京绿茵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赞助方）共同举办的“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活动从2018年8月开始，历史一年的时间在2019年9月初终于揭晓。评委会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三千多份知青作者（其中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503人）来稿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和评定，最后评选出一等奖作品145篇，二等奖作品112篇，三等奖作品113篇。”获奖作品共370篇，全部编入《永远的知青》——中国知青作家杯优秀作品选集中，共四卷137万字。本报特约撰稿人董丰的作品荣获一等奖。

现在很多七零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并不了解中国知青这个群体当年的真实的生存状况，因为诸方面原因，官方对这段历史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价也不是很多。但如果你从头至尾翻阅一下这四部《永远的知青》，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中国知青。

从牧区到农区——罗庄印象

1968年7月我从北京到内蒙锡林格勒盟牧区插队，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时至1970年秋，患肝炎在北京治疗了几个月之后我的黄疸指数和转氨酶终于趋于正常，到了返回草原的时候了。但是生病伤了元气，原来紧致的人体虚发了一圈儿，蒙古高原的严冬将至，估计一时半会儿身体难以适应。

我的姐姐董盈是中学5年制实验班的67届毕业生，1968年年底和一帮同学到雁北插队。那里虽然是盐碱地，穷得叮当响，但是毕竟是内地，气候好一些。同村知青杨百揆把县知青办接收我的批文办了下来，于是我借坡下驴，年底前到内蒙办妥了手续，转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罗庄插队。

因为不是从学校直接分配到山西插队的，所以我的名字没有在县知青的花名册里，但是在罗庄插队的短暂生活帮助我了解了当年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仍然是一段珍贵的经历。

第一次踏上罗庄的土地是1970年夏天，那是在内蒙插队两年后回北京探亲，中途转道山西看望姐姐。初到访，我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里的知青没有社会上流行的痞子气，很理性、知性、成熟，至少说话里不带有令听者难堪的脏字，像是一股清流。罗庄的女知青都是我中学甚至小学的校友，她们乐观清纯，文雅自律，保持了很多书生气，相比牧区知青更有集体感，这也是罗庄吸引我的原因。

我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在文革前是北京最好的女校，北京四中是最好的男校。文革中学习好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而作为“修正主义”学校的学生在插队时必然要被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女附中和四中学生在山西的插队地点就是雁北地区最贫穷的山阴县。罗庄的知青组最初有十一个男生，十个女生。我到罗庄时人员开始松动，陆续有人离开。

从牧区转到农村插队，我感觉有得有失。牧区虽然自然条件恶劣，生活环境原始，但是畜牧业的产出是马、牛、羊、骆驼，每年大队的收入不错，一人一

天的工分值接近一元。牧区放牧工作的工分计算以畜群为准，男女同工同酬，知识青年经济上可以完全独立，至少衣食不愁。

罗庄位于雁北桑干河畔的盐碱地区，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村里一个男劳力一天记10分工，工分值8分钱。女劳力一天记8分工，每天能挣6分4厘。知青第一年下乡，国家供应528斤带皮粮，以后就和农民一起挣工分、分粮食。一般的小队每人分三百多斤带皮粮，少的只有二百七八十斤。辛苦一年下来，不少人挣的工分不但不够分到的口粮钱，还欠队里的账。即便有余款，队里也只给你写一个欠条。所以知青在经济上根本无法自立。

当时雁北的农业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农活基本靠人力。谷物脱粒靠人扑打，用的是战国时期就有的农具连枷。庄稼地的平地用人拉石头碾子完成。脚踩在翻耕过的松软土地上，拉着石头碾子一天走下来膝关节酸痛。除了农忙抢种抢收，雁北的女人结了婚就不下地干活了。女知青初到农村，拉石碾子平地，和男人一样一干就是一天。比起牧区的骑马放牛，农村的劳动强度更大、更辛苦。

内蒙牧区生活环境比较原始。蒙古包后面就是天然厕所，浩特（畜群组住地）里的狗很快会把粪便清理得干干净净。在罗庄我们有了男女厕所，多了隐私保护，但是初见一个将近一人深、两米多直径的大粪坑还是让人生畏。人要蹲在石头砌的坑沿儿上脸朝外便溺。坑里要经常填土，以便以后起粪时人能下到坑里把粪土铲出来做农田肥料。

我印象里的猪都是肥头大耳，好吃懒做，在猪圈里踩着烂泥晒太阳。这里农民自家吃不饱，养的猪经常放养在外吃百草，一个个精瘦灵活。它们时常闯进厕所，跳下粪坑拱食，再利索地蹿上来。我初来乍到感到惊奇，立马对猪的形象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

知青食堂里有大队的一个妇女给大家做饭。我们的主食顿顿是玉米发糕，副食是胡萝卜和土豆丝泡成的一大缸窝酸菜，很少有荤腥。粮食不多，顿顿都要精打细算才能撑到新粮下来。每人一年分十来斤带皮

麦子，送到磨坊磨成面粉，又轻了不少。平时粪坑里都是清一色的黄色。一旦有外村人挑担子来卖新鲜菠菜，粪坑里才会突现一坨坨新绿。

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农民，但是在新中国最苦的还是农民。三年大饥荒中城市的粮食副食供应很差，连蔬菜都是限量供应。妈妈由于饥饿双腿浮肿。我跟别的孩子到胡同西口《天源酱园》厂的垃圾堆拣做酱菜的下脚料回家补充菜食，在后院大槐树开始飘香的时候用带钩的竹竿采摘槐花拌玉米面蒸食。但是北京市区很少有人饿死，几千万人口饿死大多发生在农村。

到1970年，罗庄交过公粮以后分给农民的口粮不够糊口。家里孩子多的分到的口粮多一些，全家搭配着尚可度日。单身汉一个人分的口粮不够吃，他们或者给相好的人家帮忙，然后搭伙吃饭，或者半年劳动、半年到内蒙流浪讨饭。即便这样，还不断有人到农村查账，看有没有瞒产私分。

我不明白村里怎么那么多光棍汉。姐姐们说，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又舍不得花灯油钱，天黑了两口子干嘛？地方穷又没有计划生育措施，家里生了男孩养不起也舍不得丢掉，常常有女孩生下来就被溺亡。失去女儿的母亲可以做奶妈一个月挣10元钱，顶一个壮劳力在地里干几个月。这让我想起了北京大兴县的红星奶牛场，养公牛消耗饲料不划算，往往把牛犊处理掉，独占母牛的乳汁，都是经济驱使的选择和无奈。长年下来，罗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少男人成年后娶不上媳妇，幸运的西渡黄河娶个陕北姑娘过来。陕北生活更加穷困，让人难以想象。

虽然农业学大寨已经多年，我看到的罗庄还是一个穷乡僻壤。村舍大多是用土坯旋的窑，木料用得极少。纸糊的窗扉，留一个小小的玻璃窗透亮。盐碱地产量低，分给各家的自留地很少，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发展副业和农贸。光靠大田里的收成难以维持村民生活，卯足了劲儿也刨不出足够的吃食。村里村外树木不多，光秃秃的主干上树冠很少。我当那是什么特殊树种，知青告诉我，枝叶被村民砍去烧饭暖炕了。虽然山西盛产煤炭，但是农民买不起煤，主要还是使用秸秆柴禾。

俗话说“虱子多了不怕咬”，来到雁北的穷乡僻壤，知道干了活儿也挣不到钱，还要倒贴钱，知青也就别想钱了。每天踏踏实实干活儿，有饭吃，有朋友相佐，就好了。

村里的老百姓虽然不富裕，日子照样过。村里的女人依照古风，把发际线刮剪得整整齐齐，自有一番风韵。她们笑话这些北京女青年没有清脸修鬓的习惯，不好看。

（下接第B3版→）